

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体系的价值定位、 承载内容和主要特征

刘明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 党的建设教研部, 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 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作为一种指导性认知范式, 承担了意识形态解释、动员、整合等基础性功能, 是实现党的执政行为赢得广泛社会支持目的的有效价值系统。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体系变迁与调适中, 从总体上不能脱离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基本范畴。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体系包括人民立场、政党使命、社会公平、国家建设、民族复兴等主要表达内容以及相应独特鲜明的特征, 它们在一定意义上直观反映了执政话语体系的转型走向。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执政话语体系;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D 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4) 01-0001-07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⁴⁶话语体系是人类的一种认知范式, 它以概念范畴、判断推理之间的优化组合而形成特定的象征符号, 并遵循一套严谨规则输出价值观、表达立场, 旨在说服什么、信奉什么、规约什么、克制什么, 从而对受众施加影响。可见, 话语体系本身具备意识形态基础性特征, 即导向功能或整合功能。作为一种观念上层建筑, 执政党话语体系是现代政治组织论证执政主张、调节执政秩序以及建构执政权威的重要方式, 因此, 兼具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执政党话语体系离不开其传播对象即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关注。同时, 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快速剧烈, 前瞻地推动话语结构优化及其价值重建, 以保持强大解释力、灵活性和适应性, 进而实现塑造观念认知、凝聚价值共识、涵养政治态度, 是执政党话语体系充满生命力的关键。人们可以从执政的维度或革命的逻辑来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的双重角色, 即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需要在革命性锻造中变得更加坚强。党治国家或党建国家的运行逻辑一定意义上是从意识形态领域开启的。它一方

面与承接新时代的使命任务、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风险挑战、需要达成思想共识直接相关; 另一方面乃基于价值体系的整合在推动后发现代化国家体系建设中成本低廉但效果明显的因素使然。当先进的政治力量与社会民众的互动合作, 成为影响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性因素时, 或者说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紧密关系的存在, 成为决定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基础动因时, 很难不去考虑执政话语体系的变迁与调适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而且也将决定党的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在现代政治中, 执政体系都是围绕政党展开的, 是政党为合法掌握国家政权, 并有效运作国家政权所形成的一套综合工作体系”^[2]。执政话语体系的建构也应当符合这一内在规定性。

一、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体系的价值定位

新时代10年以来, 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具有里程碑意义。契合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动, 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

[收稿日期] 2023-06-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8BDJ016)

[作者简介] 刘明(1977—), 男, 福建宁德人, 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执政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系也在同步变迁、调适并逐步走向定型。但不论如何变更或转型,其意识形态的功能属性不可能消失。执政话语体系的解释功能、动员功能、整合功能等并不会随之淡化或消逝,相反却因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社会调控基面扩大、价值统摄的难度增加以及政治体系绩效维系的波动性等因素,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强化。

(一) 诠释基本主张

话语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工具,社会性是其主要特征。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并非只是简单几个抽象词汇的集合,而是一套由核心概念、认知框架、文化基因以及生产传播机制等构成的完整系统,是在执政党与民众互动中呈现出来的语言符号象征,具有很强的政治属性。它表现为解释执政党政治主张、传播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有效主导政治社会化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的执政话语体系的重要功能取向至少可以分解为传递政治意志、表达政治立场、传播政治理念、增进政治沟通以及塑造政治认知等5个方面。所有这些方面归纳于一点,即话语体系对于执政党的价值,是为其存续及运转找到可靠且稳定的观念支撑。依靠执政话语体系的传播,中国共产党为其执政行为提供意义阐释系统。社会各阶层由此获得对政党纲领和国家意志的全面知晓。例如,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对未来5年的顶层设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等,均是党的执政主张的直观展示。“从严治党”“绿色发展”“国家治理”“共同富裕”等高频词汇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等,它们在发挥意识形态解释功能的同时,使党的执政话语体系回归到新时代中国社会现实,并清晰地落位于各自的叙事空间之中。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不是抽离于现实基础,而是置身于新时代潮流,其变迁与调适虽然起步不久,但是,在创造政党与社会的沟通对话、一体共生方面被赋予长远意义。

(二) 整合价值观念

社会的良性运行离不开一定规则以及在此之上具备语言修辞功能的价值符号体系。执政党协调和引导社会的方式可以分为多种,除利益驱动、政策设计、制度供给外,意识形态的价值整合或观念调适是一个相对便捷的途径。显然,党

的执政话语体系天然拥有上述功能。首先,作为一种认知系统,执政话语体系可将标定目标化为崇高信仰,在寻求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平衡的前提下实现对个体的观念整合,进而在追求者中形成强大的内驱动力,为执政党的政治行动提供社会性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执政行为都不可能仅仅依靠强力来维系,何况涉及精神层面的问题更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其次,依托一定方式,党的执政话语体系得以有效传播,不但可以减少异己力量及其负面思潮的袭扰,而且还能够控制执政成本的无效支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快速变迁自然反映在人们思想观念层面,多元价值冲突成为一种常态,平抑价值紧张,保持它们之间的合理张力,党的执政话语体系的识别、纠错的优势作用正体现于此。例如,“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敢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遏制城市‘摊大饼’式发展”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等均是反映观念调适的话语。中国共产党在保持执政话语体系开放性的同时,将有效抵制意识形态在社会变革中的观念消解功能。

(三) 促进政治认同

不论执政话语体系以何种面相呈现、采取何种修辞形式、运用哪类传媒介质,一个核心功能是为执政党执政权进行理性辩护,强化社会的政治认同。首先,话语权建设的终极目标是掌控意识形态领导权。“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政治系统试图说服社会成员、取得后者的认同和支持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特定的权威阐释系统,是一种能够提供政治认同和引导民众政治态度的符号模型”^[3]。当执政话语体系以一定的政治符号传播至社会成员个体,其核心价值内化为人们思想观念时,便是一个政治认同达成的过程。其次,话语体系在多大程度反映公共利益、契合受众的接受心理,就有多大幅度为社会所接受,执政党也因此将获得相应程度的政治支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以独特叙事风格对执政理念作出指导性说明和权威性阐释,且这些说明和阐释被赋予极强的感染力。例如,“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中国共产党

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等等。它是一种在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中基于信任基础上对政治组织所产生的依赖感、归属感和安全感。从这个角度上说，执政话语体系是党整合社会的重要政治资源，随社会变迁不断优化和调整话语体系，更好地论证党在政治体系中领导的正当性以及体系本身的优越性，是反映和遵循政党政治规律的合理选择。

（四）开展社会动员

动员是基于信息传播有效展开的、主体与客体交互参与的实践过程。受经济体制、流通信息、传播方式、文化程度以及客体对信息本身的偏好等因素影响，社会动员形态随之变迁，人力资源的调节配给呈现高低不一的效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艰巨性，决定动员式治理的历史必然性。首先，长期执政条件下社会动员中的程序性原则和合规性原则，要明显强于战争年代。党的执政话语体系承载着极强的社会动员功能，是一种拥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动员模式。例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等。党的十八大之后，“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开弓没有回头箭”“发扬‘钉钉子精神’”“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务必”等话语口号，都体现着变革时代的价值期待和行动导向。其次，清晰、简洁的执政话语风格实现党对社会思潮的有效引领，尊重多维基础上主张一维价值导向，符合社会的价值预期，因而发挥着凝聚人心的动员效果。有学者指出，“任何社会动员所蕴含的价值导向，都会被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置于价值与事实合法性的平台上加以考量”^[4]。从更深层次上说，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体系为不一致的社会群体提供符合公平正义、反映时代特征的总体认知范式，解决了作为观念体系应该解决的问题，社会迸发活力并实现有序政治参与，执政党也因此获得社会向心力。

（五）回应结构变迁

社会变迁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进程，横向上的分化与重组、纵向上的前行与后退等宏微观的变化，都可能引致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调整。这种影响可能是结构性的。首先，党的执政话语体系应当且能够及时敏锐地捕捉和回

应这些现象。例如，利益分化引起阶层结构的变动；市场发育成长的同时，个人对传统单位体制依附性松动；商品经济等价交换原则对党内关系的渗透等等。有学者认为，“这一深度的社会转型激发了社会活力，催生了新生的社会行动者，瓦解了原有的政治中心的等级结构，改变了原有的社会联系、交往方式，从而也引起了社会价值观念的转换”^[5]。在当代中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离不开对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分析和把握。执政话语体系问题也只有置身于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迁的情境下去观照，才能真正把握转型的方向和调适的力度。其次，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体系在反映社会变迁、解释人们思想困惑中日益变得合理规范、通俗易懂，极富理论解释力和目标导向意义。例如，“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城乡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等等。在分享这些象征符号的意思表达中，执政党与社会的互动意义被建立起来。执政话语体系当然必须是一个经得起理性考量的价值系统，但同时还须兼顾意识形态的世俗化特征，在回应社会变迁中祛除神秘因素，才能在彻底揭示事物本质规律的同时为人们所接受。

二、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体系的承载内容

话语传播实质是一种信息流通，因此与受众的关联性决定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关联性疏松，则易于贬损话语体系原本提供认知规范、整合观念冲突等功能。这一运行机理意味着话语体系中核心内容的显性前置至关重要。“传递的信息是否具有社会进步的意义，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政治传播的共同特点”^[6]。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体系的承载内容，应当是指它所表达和涉及的主要方面或者所指向的实质性领域。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党和国家、民众和民族、公平与正义等核心概念进入中国主流政治话语体系时，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传播。

（一）人民立场

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和执政伦理取

向,也是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体系的主要表达内容。它既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有关,也符合意识形态传播规律中目标对象的优先对待法则。(1)执政话语体系要与民众的价值诉求相衔接,获得广泛性的社会认同,不能不重视对民意的把握。其原因在于,话语体系的传播事实上是执政党以一定公共修辞符号说服、影响或改变受众的政治态度,以期获得持续性社会支持的过程。例如,“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等在主流话语情境中常被听到,党的二十大报告继续强调“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人民立场的坚守反映中国共产党对群众朴素情感依赖的恒定回应。(2)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体系调适还须关照利益分化导致社会阶层结构变动的事实。也就是说,党群关系紧密性的逻辑,须贯穿于执政话语体系的转型与定型的全过程。在利益需求属性单一的情形下,执政党话语体系较易实现传播动员的一致性。异质化社会条件下,党的执政话语体系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而导致沟通不畅的问题,使得大众或小众群体均能基于信息完整而保有合理的价值诉求,进而明晰在社会参与中的角色和权益。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民立场还意味着在分化社会中建构一套有效的执政话语体系以提供大多数人愿意信守的价值标准十分必要,它能使人们以合作者而非对立者、行动者而非旁观者的身份共同参与到社会治理中来。

(二) 政党使命

中国共产党拥有强烈的使命自觉和行动担当。基于思想理论的先进性、组织体系的严密性、利益代表的广泛性以及自我净化的调适力、权威高效的资源配给力等基因禀赋的考量,中国共产党在现代政党谱系中可称之为使命型政党。(1)作为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价值系统,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体系充分表达和演绎了政党使命这一重要内容。例如,“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

等。毫无疑问,“离开历史使命这一本质性维度,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就失去了价值与目标指向,就丧失了灵魂与内核,就无法有效开展与推进”^[7]。(2)政党使命作为执政话语体系中的重要表达内容,反映了政党自信及其背后的政党力量,并且这一切源自于大众对党的核心价值认同而形成的社会支持的制度化水平。话语体系的整合功能始于利益而终于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执政话语体系的传播促成政党使命与人民立场的内在统一,因此是一个彼此增益的过程。中国政治的逻辑是党建国家。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枢纽,中国共产党完成这一历史使命不能简单停留在意识形态观念层面。当使命型政党的表达形态融入人们的话语情境时,除了表明社会对其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合法性的确证外,还预示着隐于话语之后的维系使命的基本行动逻辑必不可少,如战略安排、制度设计、政策调适等。

(三) 社会公平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反映了社会交往中人们在性别身份、生存发展、政策享有等方面的权利义务对等的价值期待。显失公义的社会可导致民众焦虑感上升、社会信任体系面临撕裂的风险。(1)中国共产党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定倡导者和维护者。市场经济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满足经济发展合理性的同时,其竞争机制易于导致资源财富集聚倾向,并因个体能力素质、资源禀赋差异性而形成“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党的执政话语体系只有将社会公平作为核心价值导向和主要表达内容才能保有其合理性和吸引力,在理顺各种利益关系基础上使社会纳入平稳的基础秩序中,防止秩序感缺失而导致的心理落差演变成社会逆动员的潜在诱因。(2)党的执政话语体系应当时刻保持对公平正义原则的传播和维护。尤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与制度政策迁延性的叠加,一定意义上平添社会不公的机率。因此,党的执政话语体系需要围绕这一内容给予持续性的关注和表达。例如,“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等等。

“秉持公正正义理念的公共权力发挥才能够在各个层次、各个方面、各个程度上协调各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维护社会大众的各种正当权益”^[8]。公平正义的话语情境表明，执政党不能不去关注分化社会下困难群体对资源的渴望，并通过政策制度调整等方式逐步纠正资源配置的倾斜性，以破解社会不公和平复愤懑情绪。

（四）国家建设

现代经济体系和社会体系的建构，需要由国家力量来主导并完成，而现代权威国家力量的建构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依托纵向的组织体系和横向的统战体系，中国共产党具备了领导国家建设的二维支撑性框架。政党主导国家政权建设，党建国家的政治理想便有了展现的可能。（1）国家建设是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体系中重要的核心概念。例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等等。正如有学者指出，“在全球化时代，话语体系已成为塑造国家形象、捍卫国家权益、促进文明交流的重要意识形态工具”^[9]。（2）国家建设话语情境的营造与培养，表明现代国家治理与发展方面呈现高度稳定和成熟的形态，更反映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自信。国家建设维系于政党，国家作为取决于政党作为。但是，国家建设和发展还有其自我规定性和运行机理，需要具备引领和推动经济社会变革的基础和能量。例如，潜在性发展预期、开放性观念、战略性追求以及有权威效度的法规等。思维超前性往往成为社会深度变迁的战略基点，由此催生出开放开发社会活力和动力，形成基于防范危机而非摆脱危机的国家安全应急体系。显然，它们提供了国家建设话语所依托的传播取向和阐释空间。

（五）民族复兴

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调适与建构中，意识形态的统合功能日渐被唤醒，并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感召力。毫无疑问，民族复兴是一个串联历史、现实与未来，观照不同社会群体的重要话语词汇。（1）执政话语体系中民族复兴的表达，其意义在于以精神文脉滋养民众、塑造人格，形

成激发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价值引擎，画出社会共识的“最大同心圆”。例如，“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执政话语体系传播中，中国梦的表达发挥着重要的信仰导向和心理建设功能。（2）伴随中国式现代化与民主化，现代国家建设将在全面转型中成熟，民族复兴的远景随之可期。融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价值符号体系的日益成熟，使得党的执政话语体系能够延伸和触及社会各阶层群体。正如有学者指出，“价值体系一般会通过道德层面、理想层面、信仰层面的逻辑演化将政治价值、政治目标、政治利益凝聚在社会不同个体的内心深处，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政治价值和政治利益在社会个体心灵深化的内化”^[10]。党的执政话语体系建构应该紧紧围绕包括民族复兴在内的重要词汇来推进。

三、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体系的主要特征

话语体系的生产与传播过程离不开对文本的关注。“文本维度主要研究文本的语言，悬置其他因素，仅从文本意义与结构出发，对其进行语言学的分析”^[11]。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体系具有独特鲜明的叙事特征。不论核心词汇还是认知框架、生产传播机制，在话语情境的表达和符号修辞的创造方面均呈现出原创性与包容性、政治性与思想性、革命性与建设性、权威性与生动性以及民族性与世界性辩证统一等特征，直观反映执政话语体系变迁空间和转型走向。

（一）原创性与包容性的辩证统一

执政话语体系是反映执政党政治意图的价值体系，以一定的理论面相在社会中实现信息传递和流转。从话语体系的衍生、变迁、调适及定型等若干环节来看，原创性和包容性是其首位性表征。一方面，原创性涉及话语体系的主体问题，并且表明政治象征符号的初始性和开拓性。基于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情势，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任务要求、风险挑战以

及矛盾问题,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体系在议题设置、思辨精神以及表达语境等方面,构建出体现自身特质的叙事风格和认知范式。例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压舱石’与‘助推器’”“拧紧‘总开关’”“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等。另一方面,原创性并不拒斥包容性,虽然它预示执政话语体系的生命力和活力,但却是在吸纳其他意识形态观念中有益价值因子后,才能充实和壮大执政话语体系的底蕴,进而掌控话语权。包容性特征对于多元利益格局背景下满足价值诉求、实现社会整合意义巨大,“执政党通过其包容性的意识形态来统摄各种价值理念,给人们的行动以价值上的指引和意义”^[12]。例如,“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等。执政话语体系的原则性与包容性的辩证统一,体现党所主导价值体系的主体性、独特性与开放性,完整系统地展示执政党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贡献。

(二) 政治性与思想性的辩证统一

话语体系传递政党价值观,必然体现政党意志。一方面,政治性是一个主要特征。或者说,这些象征符号之所以有强大能量,并非因为符号本身而是基于符号背后的传播系统。有学者认为,“若有足够的耐心去研究象征符号的流通机制,就应对整个现世生活的历史予以总体考量”^[13]。党的执政话语体系作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集中表现为以一定概念符号的系统集合论证政治体系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明确社会成员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使之置换成凝合社会力量、调节政治秩序、巩固执政基础的信仰体系。例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性作为政党价值观的当然特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功能。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执政话语体系的独特性,还在于建构一套科学先进的思想理论体系以培育合理的行动逻辑。它应当植根人民立场,呼应历史使命,反映社会规律。因此,思想性是另一主要特征。例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

其科学的理论内涵和严密的逻辑体系无不彰显强大的思想引领力和理论魅力。政治性体现支配规则或行动逻辑,而思想性则反映文本品格、理性范式,两者共同拓宽执政话语体系传播的广度和深度。

(三) 建设性与革命性的辩证统一

执政话语体系中,执政党与革命党是常见政治语汇。一方面,当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时,那些为巩固政权的斗争要逐步让位于国家建设。尤其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深度变迁的背景下,执政党依照法律领导国家治理的能力是根本性、基础性的。所以,它反映的是建设逻辑。如果这种转型不成功,将可能扭曲党的领导和国家建设。与此相匹配,建设性成为执政话语体系的主要特征。例如,“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另一方面,从学理上说,执政党与革命党的特性差异化明显,但是这种区别是基于发展而来的。就同一个政党而言并不是机械对立的,而是统一于中国共产党本体。党的建设战略目标固然有契合现代化发展而重新定位的必要,但无法与历史传统完全剥离,应当保持发展的延续性。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革命性的基本逻辑便源于此。例如,“勇于自我革命”“革命理想高于天”“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等常被谈及。执政话语体系中革命性的叙述特征表明,那种把革命与阶级斗争简单绑定,由阶级斗争不再成为主题而得出淡化革命性或“去革命化”结论,简单割裂、裁剪原有的历史,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刻板思维。

(四) 权威性与生动性的辩证统一

一方面,从政治沟通过程来看,党的执政话语体系常常以正式文件、官方会议、党报党刊等通道呈现出来。在这种情形下,执政话语体系往往承担战略规划、政策发布、行政管理等具体作用。可以看出,执政党传递的政治信息是刚性的、一维的,因其不容置疑的特点而具备权威性和强制性。新时代党的话语体系权威性特征,既由其承载的文本内容所决定的,又是基于沟通渠道的组织化因素,即来自于科层的指令。权威性的叙事风格表明,执政话语体系沟通动力来自于执政党及其政府,沟通指向则趋于社会民众。它

较好地解释意识形态动员或渗透的显性功能的缘起。另一方面，执政话语体系的权威性并非与生动性相对立。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形态的弹性与否，将直接影响对现实的指导程度。政治信息策动的始发阶段就应当关照到受众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并以此来修正象征符号、过滤噪音或杂音。因此，生动性反映了执政话语体系还应具备灵活性、适应性的一面。例如，“鞋子合不合适，自己穿了才知道”“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治大国如烹小鲜”“打铁还需自身硬”等。执政话语体系的梳理与建构中，往往面对大量没有政治背景的公众。解决好文本抽象性和传播生动性的兼容问题，而不是陷入艰深晦涩、自说自话的党八股境地，是执政话语体系变迁、调适与转型的关键。

（五）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民族国家的建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国家建构的逻辑异于西方，其起点与使命也完全不同。“通向现代民主政治的道路仍然只能是渐进的中国式的，应当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和文化背景寻找适合自己的民主化模式和路线图”^[14]。相应地，在党的执政话语体系中民族性的叙事特征得以充分演绎。例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等。中华民族大一统形态存续及中国现代国家的发展，与吸纳融合、互敬共存等特定历史文化综合生态不无关系。因此，执政话语体系的传播不能不考虑这一特殊性。另一方面，如果只拘泥于本土风貌的一域疆界，执政话语体系视界未免过于窄化，正所谓民族的也即世界的。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1]⁴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还在于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传播“中国奇迹”“中国力量”中，需要更多地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展示有担当作为的大国风范，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传播好中国声音。例如，在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对话而不对抗、拆墙而不筑墙、融合而不脱

钩、包容而不排他”等，就是很好的话语表达。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兼容，使得执政话语体系实现由古至今、由内到外的语境表达的方式变更。它表明在资源稀缺的背景下，合作共享是国家之内和国际之间的实践形态。忽视这一对法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伤害。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林尚立. 当代中国政治：基础与发展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7：123.
- [3] 孙关宏，胡雨春，任军锋. 政治学概论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266.
- [4] 蔡志强. 社会动员论：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72.
- [5] 王邦佐. 执政党与社会整合：中国共产党与新中国社会整合实例分析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60.
- [6] 谢岳. 当代中国政治沟通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49.
- [7] 李海青. 百年大党：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6.
- [8] 刘金菊. 中国共产党社会动员力研究 [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22：83.
- [9] 张维为，吴新文. 中国话语：建构与解构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6.
- [10] 廉永杰，周家荣. 当代价值体系的比较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114.
- [11] 刘海龙. 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 [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13.
- [12] 罗峰. 嵌入、整合与政党权威的重塑：对中国执政党、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考察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68.
- [13] 沃尔特·李普曼. 舆论 [M]. 常江，肖寒，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169.
- [14] 萧冬连. 筚路维艰：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214.

（下转第15页）

Value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the Party’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during His Tenure in Fujian

ZHONG Faliang¹, WEI Zhenlei²

(1. School of Marxism, Longyan University, Longyan 364012,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Deepening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s an eternal task for the CPC. During his tenure in Fujian, Xi Jinping made a series of important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which opened up a new chapter in enriching and developing Marxist Party-building theory; provided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advanc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n Fujian Province; laid the basic prototype for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with unique value implications. In the new era, Fujian Province should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important ideas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Xi Jinping during his tenure in Fujian, first, to clarify the “mainstay”, resolutely uphold the “two Upholds”, and strengthen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second, to focus on “drawing a blueprint”, relying on the “digital Fujian”,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third, to boost the “youth aspiration”, empower the training of young cadres, and improve the political capacity of the Party; fourth, to explore the “new formula”, build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Party, and purify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the Party.

Key words: Xi Jinping;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Party construction; Party-building theory

(责任编辑 冯庆福)

(上接第7页)

On the Value Positioning, Content, and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rty’s Ruling Discourse System in the New Era

LIU Ming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for Party Construction, Fujian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Fuzhou 350108, China)

Abstract: As a guiding cognitive paradigm, the ruling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CPC undertakes the basic functions of id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mobilization and integration, and is an effective value system to achieve the goal of the Party’s ruling behavior to win widespread social support. The ruling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Party in the new era, in the course of its transformation and adjustment, cannot be separated, in general, from the basic categories of national interests and public interests. It includes the main expressions of people’s stance, Party’s mission, social equity, national construction,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which in a certain sense directly reflect the transformation direction of the ruling discourse system.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uling discourse system; ideology

(责任编辑 冯庆福)